

百花燕归,万象京华——写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京举办之际

光影奔流一甲子，百花燕归在京华。

随着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的召开，本届活动定于8月上旬在北京启幕。跨越六十余载光阴，这朵诞生于“双百”方针沃土、由全国观众亲手浇灌的文艺之花，再度回归新中国电影的初心原点。我们回溯来路、溯源根脉。在历史的回响中，读懂百花奖为何为人民而生，为何向时代而行，为何此刻归京盛放。

诞生:北京孕育了新中国第一个群众性电影奖

百花的根，深植于北京的文艺文脉，深植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初心。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倡导推动下，大众电影百花奖正式创办，起点北京。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群众性电影奖项，也是至今唯一始终坚持大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电影奖项。自诞生之日起，它就立下了最朴素也最坚定的准则：电影好不好，由观众说了算。

奖项定名“百花奖”，取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党的文艺方针，寓意文艺园地群芳竞艳、人民审美多元共生。从命名之初，它就烙印着鲜明的人民属性，锚定了“大众主导、观众说了算”的核心底色。

彼时的中国电影，正迎来第一个创作黄金时代。《大众电影》杂志面向全国读者发起投票，一张张手写勾选的纸质选票，从街巷、工厂、乡村涌向北京。首届活动便收获超11万张有效选票，万千普通观众以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选出属于自己的年度电影荣光。在那个以纸质媒介为主的年代，来自天南海北的选票，汇聚成新中国文艺史上声势浩大的群众声音。

1962年5月22日，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镌刻下载入史册的经典时刻。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郭沫若先生等为获奖者颁发荣誉，彰显了国家对群众文艺、电影事业的高度重视。谢晋执导的《红色娘子军》获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等四项大奖，成为百花的时代标杆；青年演员祝希娟凭借鲜活的角色塑造，成为新中国第一位“百花影后”。吴琼花的热血风骨、红色光影的时代力量，透过六十余年光阴依旧鲜活。

回望初心，北京不仅是首届百花奖的举办地、颁奖地，更是新中国电影评奖制度的发源地。在这里，“人民评判文艺”的理念落地生根，百花奖由此开启了属于中国观众的光影纪年。

成长:从北京走向全国的“观众奖”

从首都的授奖礼堂到遍布神州的光影盛会，百花奖六十余载的成长轨迹，是一部自北京出发、向全国拓展的奋进史。无论脚步走得多远，北京始终是它不变的初心原点与精神锚点。初创时期的百花奖，深深扎根于北京的文艺沃土。1962年首届、1963年第二届授奖大会均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国家领导人出席、文化界名家颁奖，高规格的起点奠定了奖项的国家级定位，也让北京成为百花奖当之无愧的诞生地与根脉所在。

1979年，随着《大众电影》杂志的复刊，百花奖也在群众的呼声中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1980年5月23日，第三届百花奖授奖大会重回北京政协礼堂举办，这一届百花奖收到了200多万张选票，创造了中国群众参与电影评奖的一个高峰。这一届百花奖奖杯由北京市珐琅厂以景泰蓝工艺匠心打造，古都非遗技艺与电影荣誉相融，留下了鲜明的北京文化印记。恢复后的百花奖并未止步于北京，很快开启了走向全国的探索，1981年第四届百花奖落地杭州，成为奖项创办以来首次走出北京的颁奖活动，正式拉开了全国巡办的序幕。

整个80年代，百花奖在探索中

不断拓展足迹。从第五届的陕西西安、第六届的福建福州，到第七届的山东济南、第八届的四川成都，奖项足迹相继覆盖华东、西北、华南、西南多地，让各地观众得以近距离参与这场群众电影盛会。与此同时，北京始终是重要的落脚点：1986年第九届百花奖与第六届金鸡奖在北京西郊中国剧院联合颁奖，1988年第十届百花奖重回全国政协礼堂，1991年第十四届百花奖颁奖活动在北京市二十一世纪饭店举行。“立足北京、辐射全国”的格局在这一时期逐步成型。

1992年是百花奖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当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正式创立，双奖活动升级为综合性电影文化盛会，首届电影节落地广西桂林，当年第十五届百花奖同步颁发。以此为标志，百花奖形成了全国轮流承办、各地协同参与的常态化机制，成长为属于全体中国观众的国家级电影奖项。此后十余年间，电影节先后落地广州、长沙、昆明、佛山、重庆、沈阳、南宁等十余座城市，带动地方电影文化传播，也让百花奖的群众基础持续夯实。这一阶段，北京仍见证着它的成长：1995年第四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回到北京举办，第十八届百花奖在中国大剧院颁出，成为奖项发展历程中一次意义特殊的“回家”。

进入新世纪，百花奖持续迭代升级。2005年起，奖项调整为每两年举办一届，与中国电影金鸡奖隔年颁发，评奖机制更加成熟规范。奖项足迹遍布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西北、华中、西南大地，不同地域的文化气质为百花奖注入多元活力，也让“观众奖”的影响力渗透到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

六十余年步履不停，举办地在变、舞台规模在变、传播形式在变，但百花奖作为中国唯一群众性电影奖项的底色从未改变，“观众说了算”的核心准则从未动摇。而北京作为它的出发地，始终是这条全国轨迹的精神原点，静静等待着跨越岁月后的回归。

回望:百花奖与中国电影的六十年

六十余载光影流转，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获奖名册，是一部由观众选票写就的中国电影简史。每一部登顶荣誉的作品，都印刻着对应时代的社会情绪与大众审美变迁。从初创时期的红色初心到新时代的多样绽放，百花奖始终与中国电影同频前行，与人民审美双向奔赴。60年代百花初绽，红色经典奠定时代底色。奖项初创恰逢新中国电影首个创作黄金期，《红色娘子军》以饱满革命情怀树立时代标杆，《李双双》以鲜活乡土生活引发大众共鸣。这一时期作品扎根现实、基调昂扬，呼应“百花齐放”文艺方针，契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的精神文化诉求。

80年代百花重开，人文觉醒呼应思想解放。1980年奖项重启，正值改革开放浪潮，创作视野全面打开。《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以深沉的历史反思，回望时代浪潮中的个体命运与精神坚守，《高山下的花环》《日出》等作品聚焦个体命运与社会百态，见证中国电影从思想解放到创作繁荣的关键跨越。80年代末期，《红高粱》以浓烈奔放的东方美学，既斩获国际影坛殊荣，也收获观众的广泛认可，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艺术表达与文化自信迈上全新台阶。

90年代多元共生，主旋律深耕与市场化萌芽并行。主旋律创作持续突破，《周恩来》树立史诗叙事标杆，《焦裕禄》《孔繁森》等英模题材感染几代观众；艺术表达同步进阶，《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彰显中国电影的艺术高度。1998年获得最佳故事片的电影《甲方乙方》，开启内地贺岁片先河，标志着市场化创作正式走入大众审美视野，印证了百花奖紧随观众喜好的群众属性。

新世纪产业变化，大片时代开启工业升级。伴随中国电影产业化

改革推进，观众审美向商业质感与类型叙事升级。《大腕》等都市喜剧延续市井共鸣，《英雄》开启国产商业大片时代，《建国大业》开创主流献礼片全新范式，实现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双重突破，记录了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成长轨迹。

新时代深耕现实，新主流叙事引发全民共情。2012年以来，获奖作品呈现“主流价值+工业水准+大众共情”的鲜明特征：《战狼》《长津湖》《红海行动》等新主流大片点燃家国情怀，“我和我的”系列串联全民时代记忆，《我不是药神》《十八洞村》等现实题材深耕民生烟火，《烈火英雄》《中国机长》《守岛人》致敬平凡岗位的信仰力量，印证扎根人民、回应时代才是好电影的永恒标准。

六十余年岁月更迭，创作面貌与观众审美不断迭代，但百花奖“观众说了算”的本质从未改变。它以选票为笔，记录中国电影成长，也珍藏着几代中国人的集体光影记忆。

归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重返北京的深意

从1962年北京政协礼堂的初次绽放，到2026年第38届活动重返北京，六十余载光阴流转，一场跨越时空的归途，终于如约而至。

这是一次空间的回环。六十多年前，百花奖从北京出发，带着人民的期许走向全国，让群众评奖的理念传遍九州；今天，它重回诞生之地，是一次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溯源，是历经各地盛放后的初心归位。

这是一次时间的纵深。历经初创、复苏、改革，百花奖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变化，也陪伴几代观众走过了光影岁月。如今归京，过往的历史沉淀、人民的初心底色、时代的发展成果在此交汇，让本届活动拥有了厚重的历史分量。

这更是一次使命的升华。立足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定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以三个维度锚定活动特色，在初心回望之上，开启面向未来的全新出发。

立足国家级电影奖项定位，彰显新时代首都风貌。作为诞生于北京、脱胎于“双百”方针的国家级电影奖项，百花奖自起点便镌刻着标杆属性。本届活动坚持首善标准，以高质量筹办推动奖项提质升级，将首都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一流的办会水准贯穿活动全流程，既呼应六十余年前初创时的高规格起点，也以国家级奖项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展现新时代首都文化建设的新气象。

突出时代性发展特质，依托全国文化中心展现电影产业新风貌。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也是中国电影产业的核心高地，汇聚创作、人才、技术、传播全链条资源。一路走来，百花奖始终与中国电影产业同频成长，从胶片时代的创作探索到市场化浪潮的工业升级，全程见证行业变化。本届活动将依托首都产业优势，搭建行业交流与成果展示平台，集中呈现新时代电影创作与产业发展的最新面貌，为电影强国建设注入持久动能。

夯实人民性核心底色，践行文艺初心使命。人民性是百花奖与生俱来的灵魂，从首届11万张纸质选票到如今千万观众线上参与，群众的评判权始终是奖项最坚实的根基。本届活动坚持人民至上，坚守文艺为人民的根本方向；坚持开放共享，拓宽全民参与渠道，让光影盛会真正走近群众、融入生活。以高质量文化经济凝聚人气、激发活力，赋能首都经济社会资源，让“人民的奖项”真正回馈人民。

百花燕归，初心不改；万象京华，向光而行。

8月上旬，北京迎接百花盛放。让我们循着历史的回响，共赴光影之约，聆听人民心声，见证这朵生于京华、长于山河的群众之花，在新时代续写属于中国电影璀璨篇章。

（中国电影家协会供稿）

《四渡》：长征题材电影的新探索

■文/张阿利

时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导演，刘烨、王雷、王志飞等主演的电影《四渡》不久前在全国院线隆重上映。截至目前，《四渡》票房突破2.7亿元大关，打破了长征题材电影的票房纪录。该片从史料挖掘、叙事手法、人物刻画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与尝试，带领观众重回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与不朽的长征精神。

“四渡赤水”是中国革命历史乃至世界军事发展史上极具经典性的案例，也是长期以来国产影视剧创作的热门题材之一。如何在观众已经较为熟悉的史实题材上创作出避免雷同化的作品，就需要从史料出发，不断发掘新的历史视角和当代价值。

在内容方面，该片一方面极大地还原了历史真实，另一方面也对史料进行了深度挖掘与多元扩展。比如在片中着重刻画了情报工作的军事细节，并且以情报作为重要线索，铺垫出敌我双方对峙的关键情节，让影片更具观赏性的同时，也让观众更加了解历史、贴近历史。为此，影片的实地拍摄取景也放在了贵州，而且是选择了与四渡赤水这一历史事件相近的季节和地点，影片虽然跨越了九十载时光，却让故事有了更为真实的时间和空间场域，也更容易让观众沉浸于当年的历史氛围之中，产生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这是一种尊重历史真实的创作方式，也是一种对待历史题材电影创新的创新。

此外，本片打破了常规同类题材电影单一视角的叙事方式，采用了层次丰富的多视角叙事手段。既有对主人公身份担当和肩负历史使命的红军领袖群像的塑造，也有对普通红军战士的信仰形成和个体成长的心路历程表达，还展示了敌军不同人物的形象特色与处境状况。在人物群像描绘的对比之中，更加凸显出红军领袖和普通战士在峥嵘岁月中坚韧的信念和执着的理想追求。

《四渡》在视听语言设计与类型化路径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跳出了传统主旋律题材电影的影像范式，呈现出一种年轻化、先锋性的视觉特征。比如，采用了较多的“推”镜头和“拉”镜头等镜头运动方式，并且配合多重时间线转场、快速剪辑，并在地图、路线的呈现上采用了大量的特效进行展示，利用“红”“蓝”字幕区分人物、地点和事件信息，信息量密集，戏剧冲突强烈，让大家在电影这种媒介中获得了当下类似“微短剧”式的观感，能够始终抓住观众眼球，满足观众接受心理。

在类型化叙事路径上，电影运用了非线性的叙述方式，通过大量的插叙与倒叙制造悬念，在影片后半部分，敌军方面布置贵阳行营进行围剿，并认为稳操胜券，让观众暂时不了解红军的战略。直至红军西进云南，视角进行了切换，故事才回溯出整个调虎离山部署的过程，这样的悬念设置也使影片的节奏更加紧张，并把双方斗智斗勇的戏剧性推向高潮，让观众为红军的

从“脸谱化”到“血肉丰满”：《四渡》完成了红色电影的“叙事突围”

■文/辛姣雅

作为再现长征经典战役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跳出了传统红色电影脸谱化、模式化的创作窠臼，以严谨的历史考究、创新的叙事手法与立体的人物塑造，重新诠释了四渡赤水这一军事史上的奇迹。影片不再是单一的战争场面堆砌与历史事件复述，而是以“绝境破局”为核心内容，串联起高层战略博弈与底层战士众相生，在宏大历史叙事与细腻人文关怀的交融中，让尘封的长征精神挣脱时代的隔阂，绽放出震撼人心的当代力量，电影的创新也让年轻人愿意重新回到影院。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险、最关键的战略部署，三万红军战士身陷四十万国军重兵围堵，在物资匮乏、前路未知的绝境中，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硬生生扭转了被动局势，为长征胜利奠定基础。过往同类题材作品，多侧重战争场面的渲染与历史功绩的歌颂，叙事线条单一、人物形象扁平。而《四渡》恪守“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全新的视角解构这场传奇战役，完成了红色史诗叙事的新突破。

影片最亮眼的创新，是打破了传统主旋律影片“上帝视角”的叙事，采用还原历史真实感的真实感。整部电影不再直白告知观众“此战必胜”的结局，而是把观众拉回1935年红军战士的真实处境。镜头跟随红军队伍辗转赤水河畔，层层铺展敌军围堵拦截的压迫感、内部战略分歧的焦灼感、前路迷茫的未知感。四次渡水并非简单的重复行军，每一次迂回、每一次攻略、每一次突围，都对应着截然不同的战局困境与战略考量。影片通过悬念式叙事，把“声东击西、穿插迂回、出奇制胜”的精妙战术，使军事谋略变得通俗易懂，也让观众真切体会到，这场胜利从来不是顺势而为，而是步步惊险、绝境求生的智慧博弈。

在叙事结构上，影片构建了双线叙事体系，实现了宏大历史与个体命运的双向呼应。上层叙事聚焦核心领导层的战略抉择与思想变化，精准刻画了革命领袖褪去教条、立足实际破局突围的成长过程。影片没有把伟人塑造成高高在上的符号，而是展现出决策者在重

压之下的犹豫、思辨与坚守。面对敌我兵力悬殊的绝境、内部路线争议的矛盾，领袖们没有天生的笃定，而是在一次次试错、研判、博弈中，打破僵化战术思维，确立实事求是、灵活应变的革命思路，让伟人形象回归血肉丰满的凡人姿态，更具真实感与感染力。

底层叙事则以普通红军战士的微观视角，为宏大史诗注入温暖的人文底色。影片原创的基层战士角色，以及一众无名将士群像，跳出了“工具人”式的群像刻画。镜头捕捉着战士们饥寒交迫的狼狈、直面牺牲的恐惧、思念故土的柔软，更刻画了他们绝境不弃、向死而生的赤诚。没有刻意煽情的悲壮桥段，没有过度渲染的苦难情愫，只是以平实细腻的镜头，记录着普通战士背着破旧行囊、踏着泥泞山路，以血肉之躯抵挡枪林弹雨的模样。正是这些平凡渺小却坚守信仰的普通人，汇聚成了革命胜利的磅礴力量，让长征精神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可感、可触、有温度的精神信仰。

与此同时，影片打破了传统战争片“正邪对立、非黑即白”的脸谱化塑造，对敌方阵营进行了客观立体的刻画。片中的敌军将领不再是愚蠢怯懦的反面符号，而是具备清晰战略思维、严谨战术布局的强劲对手。这种“正视对手、尊重博弈”的创作手法，极大提升了影片的历史厚度与叙事张力。正是因为对手的强悍与缜密，更能凸显红军战术的精妙、将士的英勇、信仰的纯粹，反向印证了四渡赤水胜利的来之不易，让这场军事奇迹的含金量与震撼力更加深入人心。

在影像美学层面，《四渡》以写实的镜头语言重构战争史诗质感。影片采用大量实景拍摄，107个真实场景还原了赤水河畔的山川地貌、长征途中的艰苦环境。硝烟弥漫的战场、泥泞崎岖的山路、破旧简陋的军备、食不果腹的军旅日常，极致还原了八十多年前的革命绝境。战争戏份摒弃了夸张的特效堆砌，以克制、写实的镜头捕捉厮杀场面，子弹穿梭、炮火轰鸣、尸横遍野的画面，直观展现出战争的残酷与惨烈。文武戏张弛有度、相辅相成，文戏深挖思想博弈与信仰内核，武戏展现战争格局与牺牲精

奇谋策划叫绝。

影片不仅塑造了大量壮观的战争场面，还以饱含人文关怀的笔触刻画出一批鲜活的红军形象。我们能够跟随电影中的赵德发看到伟大的战略背后所付出的艰辛代价，看到阿金由一个流浪少年转变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的精神传承，诸多群像的塑造构成了对于长征精神底色的形象化凸显。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领袖人物的刻画同样细腻，并没有符号化地把领导人塑造成永远只是运筹帷幄、胸有成竹的形象，而是用很多段落表现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压力和孤独。其中比较动人的一场戏，是苟坝会议之后，毛泽东深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沟通，画面里他一个人提着灯走在小路上，周围是漆黑的夜色，观众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领袖不被理解的孤独与承担决策重压的心绪。这种对人物状态的描写，反而让他们选择和坚持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寓意深远。

电影《四渡》的实践再次表明，主旋律革命历史题材的创新与探索既需要扎根历史土壤，也需要面向当下观众；既需要兼顾艺术与市场，也需要回归到人性书写与价值反思。影片在厚重与轻盈之间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其探索精神与创作诚意，为长征题材乃至所有主旋律题材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作者为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电影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神，节奏错落有致，彻底摆脱了主旋律影片“文戏枯燥、武戏浮夸”的通病。

相较于传统红色影片侧重历史复刻，《四渡》最大的价值，在于完成了长征精神的当代转译。影片深刻诠释，四渡赤水的胜利，从来不只是一场军事突围的胜利，更是一次思想的重生、信仰的淬炼。从固守教条、被动挨打，到实事求是、灵活破局，红军在绝境中完成的不仅是战局的逆转，更是革命道路、思想理念的自我革新。这种“绝境不馁、随机应变、坚守初心、敢于突破”的精神内核，跨越时空依然极具现实意义。

当下时代没有枪林弹雨的生死绝境，但每个人的生活、每个行业的发展、每个民族的前行，都有属于自己的“赤水之渡”。求学路上的困境、职场中的瓶颈、发展中的难题、时代里的挑战，都是新时代的“突围之战”。影片告诉我们，所谓奇迹，从不是天降幸运，而是绝境中的坚守、困境中的变通、平凡中的笃行。先辈们以血肉为舟、以信仰为桨，渡出了民族的新生之路，而新时代的我们，更当传承这份绝境破局的智慧与百折不挠的初心。

纵观全片，《四渡》是一部兼具历史厚度、艺术高度与时代温度的红色史诗。它以创新的叙事手法打破主旋律创作局限，以立体的人物刻画重构革命英雄群像，以真诚的历史视角致敬峥嵘岁月。影片没有刻意拔高将士的英勇、信仰的纯粹，反而印证了四渡赤水胜利的来之不易，让这场军事奇迹的含金量与震撼力更加深入人心。

在影像美学层面，《四渡》以写实的镜头语言重构战争史诗质感。影片采用大量实景拍摄，107个真实场景还原了赤水河畔的山川地貌、长征途中的艰苦环境。硝烟弥漫的战场、泥泞崎岖的山路、破旧简陋的军备、食不果腹的军旅日常，极致还原了八十多年前的革命绝境。战争戏份摒弃了夸张的特效堆砌，以克制、写实的镜头捕捉厮杀场面，子弹穿梭、炮火轰鸣、尸横遍野的画面，直观展现出战争的残酷与惨烈。文武戏张弛有度、相辅相成，文戏深挖思想博弈与信仰内核，武戏展现战争格局与牺牲精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